

interpret the development, progress and trends of studies on internal migration in the Western literature. The main foci include: economic theories on internal migration, non-economic explanations on internal migration, selectivity of migrants, methodologies in studying internal migratio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人口迁移是影响一个地区人口数量、规模、结构及人口发展过程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和空间过程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 E. G. Ravenstein 提出的迁移规律，到后来的古典经济学和新迁移经济学解释，以及非经济学因素解释，人们试图从不同的层面和学科去诠释这一现象，以及它所引起的社会经济、政策上的影响与意义。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地理学等学科都在人口迁移的理论发展和实证研究上作出了贡献。国内人口迁移，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主要产物，对国家内部区域发展和社会经济空间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美国学者 Michael Greenwood (1997) 将人口迁移的研究问题总结为五大类：第一，迁移人口的特征是什么？包括迁移者的年龄、性别、种族、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收入等人口学特征，以及社会经济特征。由此引申的研究还包括对迁移人口选择性的探讨：迁移人口相比较非迁移人口在人力资本上是正向选择还是负向选择。第二，为什么迁移？迁移的影响因素有哪些？迁移决定的过程是怎样完成的？讨论过的迁移因素包括工资差异、工作机会、失业率等经济因素，还有地方区位特征、家庭因素、行为心理因素等非经济因素。多数有关迁移动机的研究是描述性的，也有用计量模型来估计迁移决策过程，或利用心理行为认知的技术分析迁移因子。第三，人们从何处迁出，迁入哪里？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对迁移流空间分布的详细描述，还着重于地方特征如何影响迁移流。迁移人口是导致人口地理重新分配的一个重要机制，因此人口的流出和流入方向在预测区域人口变动方面的作用也受到重视。第四，迁移的时机。发达国家在经历人口转换 (demographic transition) 的时候，同时也经历了农村到城市人口迁移转换。此外，群体效应 (cohort effect) 在人口迁移中也起重要作用，反映在其绝对数量对迁移的影响，以及某一特定群体经过迁移风险不同的各个年龄段上。第五，迁移的影响。相关的研究一方面关注迁移过程对迁移个体本身的影响，另一方面注重迁移人口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影响。

第六章

Chapter 6

西方国内人口迁移研究进展及趋势

Research on Internal Migration in the Western Literature

王雯菲 Wenfei Wang
布里斯托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Bristol
范芝芬 C. Cindy Fan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系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内容简介

人口迁移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和空间过程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里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本章通过梳理和评述西方国内人口迁移的理论、研究方法和体系来把握西方国内人口迁移研究的进展以及趋势。着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人口迁移的经济学解释，包括新古典经济理论以及新迁移经济理论；人口迁移的非经济学解释；人口迁移的选择性；人口迁移的研究方法；人口迁移和发展的关系。

Abstract

As a socioeconomic phenomenon and spatial process, migration has long been an important subject within social sciences. Through analyzing and evaluating theories, explanations and methodologies, this chapter attempts to

本章内容将围绕人口迁移的主要研究问题,介绍西方研究国内人口迁移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研究体系,以及最新的学术进展和发展趋势,以期为中国的人口迁移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借鉴作用。

国内人口迁移的经济学解释

迁移规律理论

英国学者 E. C. Ravenstein 最早利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统计年鉴从人口学的角度深入地归纳了人口迁移机制,并于 19 世纪末在《皇家统计学杂志》上发表了著作《迁移的规律》(Laws of Migration) (Ravenstein, 1885, 1889)。通过总结和归纳,他提出了六条人口迁移规律:(1) 迁移率和距离成反比,长距离的迁移是基于大的工商业中心的吸引。(2) 迁移常常是阶段性完成的,移民首先迁人附近的小镇,最终迁往快速增长的城市。(3) 每个迁移流都有逆向迁移流与之并存,乡村到城市的迁移流要大于其逆向迁移流。(4) 女性人口的迁移多倾向于短距离迁移。(5) 交通、通信和技术的发展提高了迁移率。(6) 经济因素是引起人口迁移的最重要的原因。尽管 Ravenstein 的迁移规律过于简单,描述性太强,也没有来自于实证的科学研究,但对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和评价人口迁移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经过实践的考验,至今仍对不少当代人口迁移理论的发展具有影响。

美国学者 E. S. Lee 在 Ravenstein 的理论基础上,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进一步发展了人口迁移规律 (Lee, 1966)。他认为,影响人们迁移决策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与迁出地相关的因素;二是与迁入目的地相关的因素;三是与介于迁移目的地和迁出地之间的障碍因素;四是迁移者个人介入因素。以上四个方面都对迁移决策产生影响。Lee 在他的迁出地、迁入目的地以及中间障碍因素的分析框架下,还发展了一系列的关于迁移量、迁移流和逆向迁移流,以及迁移者特征的假设。Lee 的理论在 Ravenstein 提出的迁移规律上前进了一步,简单且易理解,但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观点也是建立在对现象的经验归纳上的,缺乏科学推论和假设检验,并且他的理论框架不能帮助决定哪些因素在迁移决策中更为重要。

新古典经济理论

(一)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 W. Arthur Lewis (1954) 最早对人口迁移从经济学上进行了理论上的解释。他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特征是二元结构,包括低等级的农业部门与高等等级的现代的城市工业部门。其中低等级的农业部门具有低生产力、低效率和过剩劳动力的特点。而城市中的现代工业是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并具有高效、高产出的特点。根据二元结构理论,现代工业部门依赖农业部门提供的廉价的劳动力进行扩张,当现代工业部门有了无限制的劳动力供给时,便能在保持低工资的情况下持续发展,获取高额利润。而对于农业部门来说,人口外迁正可以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如果现代工业部门将生产中获得的利润全部用于投资,形成新的资本积累,生产的扩张就会进一步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这个过程一直会持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城市的工业部门所吸纳,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被城市所吸收之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会得到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也会相应增长,农业逐渐现代化,并开始和工业竞争劳动力。最终城乡差异消失,二元经济就合为一元经济,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而无论是现代的工业部门还是传统的农业部门都从城乡劳动力迁移上获益。

Lewis 的二元结构理论简单易懂,强调了现代工业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结构差异,并从宏观层面将经济发展和人口迁移过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理论能较好地解释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符合发达工业化国家早期的城市化进程。其缺陷主要体现在:模型假设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速度以及工作机会的创造是和资本积累速度成比例的。这一点是不现实的,随着城市中工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方式发展,工业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作用在逐步下降。该理论更侧重于工业部门的发展,而忽视了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平衡,并忽视了农业投资的重要性。模型还假设工业部门的工资保持不变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完全消失。来自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证据显示,随着农村到城市迁移人口的增长,工资也随之上涨,而利润下降。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现代部门以外的非正规经济部门对吸纳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这一点也被 Lewis 所忽略了。

几年后, G. Ranis 和 J. C. H. Fei (1961) 在两部门结构发展模型基础上对 Lewis 的模型进行了改进。他们强调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 认为只有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才有可能有一部分剩余农产品来满足足迁移劳动力的消费, 这是迁移能够发生的先决条件。他们还提出了劳动力转移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无限供给阶段; 第二个阶段中, 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大于零, 工资率水平开始提高; 最后一个阶段, 劳动力边际生产率与工资率相当, 是农业和工业争夺劳动力阶段。

(二) Todaro 的预期收入理论

即使是修正后的二元结构理论也解释不了农民在城市存在大量失业人口的情况下, 仍继续涌入城市的现象。因此在 Lewis 的二元结构理论基础之上, M. P. Todaro (1969) 提出了预期收入理论。其主要思想是: 人口迁移的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乡预期收入上的差距而不是实际收入差距。这种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是由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和进城后找到工作的概率和收入, 以及迁移的实际和机会成本等因素综合计算后决定的。当预期收入差距是正值时, 农民会选择外出, 并且只要差距保持正值, 城乡的迁移会一直继续下去。当城乡实际收入差异不变时, 迁移人口在城市就业的概率越大, 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别也越大, 对农民进城越具有吸引力, 城乡人口迁移规模也随之上升。与之相反的是, 在城市的失业率较高, 同时就业机会较少的情况下, 农民就不会有很大的经济动力搬到城里。但城市就业率高, 农民进城后停留的时间越长, 找到工作的几率越大。因此, 即使城市失业率相对较高, 农民仍不断涌入城市。另一方面, 个体在做出生迁移决策时, 不仅仅考虑短期内的预期收入和成本的差异, 同时也考虑长期的预期收入和成本, 如果长期的预期收入和成本的差距能够弥补短期损失的话, 人们也会做出迁移决定。

Todaro 的预期收入理论解释了 Lewis 的二元结构理论模型不能解释的城乡人口迁移与城市失业并存的现象, 并对发展中国家城乡劳动力转移做出了简单而有说服力的解释。该理论在后来的一些实证研究中得到有效的验证, 因此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Todaro 预期收入理论的缺陷主要包含, 理论在强调个人动机的同时, 忽视了社会结构的制约因素。同时迁移很少是个体的决定, 家庭成员在迁移决策中经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而迁移也是家庭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此外, 理论考虑了城乡收入差

距、部门之间的就业率以及工资率水平等社会经济变量对迁移的影响, 但没有反向来考虑劳动力转移以及城市化对以上社会经济变量的作用。

在 Todaro 的预期收入理论发表之后, 不少人尝试对其进行拓展。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是 1970 年 Harris 和 Todaro 的两部门模型 (Harris and Todaro, 1970)。他们建立了一个两部门国内交易的迁移和失业率模型来研究迁移对乡村收入、城乡产出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只要城市的预期工资高于农村工资, 农村劳动力就会存在城市失业的条件下继续向城市流入。该模型假定城市工资率在某种程度上是外生决定的, 例如由政府法令规定, 当其高于内生决定的市场工资时, 就会导致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

之后 G. S. Fields (1975) 在 1975 年拓展了 Harris-Todaro 模型, 得出 Harris-Todaro 的模型过高估计了失业率的结论。大多数的城市招工渠道并没有把农村居民排除在外。个体可能通过亲戚或朋友的介绍来到城市, 增加找到工作的概率。还有的农村劳动力可能会先在城市非正规部门临时从业或从事兼职工作, 然后再通过努力找到在正规部门工作的机会。具有较高教育程度的迁移个体找到工作的概率要高于一般群体。

(三) 人力资本理论

新古典经济迁移理论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预测谁更有可能迁移。在 Lewis 的模型里, 当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农业部门时, 城市的高工资和工作机会就会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但是理论无法告诉我们这些迁移的群体是谁, 或如何把他们和非迁移人口区别开。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 Todaro 的预期收入理论。

Sjaastad (1962) 第一个将人力资本投资于研究迁移决策。他提出了关于迁移的一个新观点, 认为迁移过程是对人力资本的一种投资。人们通过对未来预期收益和成本 (金钱上的和非金钱上的) 的比较来决定他们是迁移以及迁移目的地。当在迁移目的地预期的经济和非经济收益大于他迁移所要付出的成本时, 个体会选择迁移, 反之则不会。存在几个不同的迁移目的地时, 个体会选择通过迁移能够带来最大预期收益的地点。该模型还可以被拓展, 将对预期风险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待预期风险的态度包括进来 (Hart, 1975)。另外, 人力资本理论对迁移决策影响的因素不仅仅是经济因素, 社会和环境因素也能得到考虑, 因此有别于仅仅重视工资差异和劳动力市场因素的迁移理论 (Greenwood, 1975)。

另一方面,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体的流动性在不同的人群间是有差异的, 例如拿年龄来说, 既然老年人享受到迁移收益的时间短, 因此相

比年轻人来说迁移率低。此外,迁移流与迁出和迁入地之间的迁移成本应该是成反比的,这一点被很多学者引申为迁移流和距离具有负相关性。以上的假设都很容易变成变量在实证模型中验证。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缺陷是个体往往没有与迁移或者目的地相关的信息,例如工作机会,如果想要获得相关的信息的话,成本就可能增加,因此在信息缺失的情况下不容易计算出迁移预期收益与成本的比较。

新迁移经济理论

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界对于人口迁移的研究重点逐步从空间和计量模型上转移到对迁移的行为研究上,关注社会和个人因素,发展了一系列从个人到家庭层面上对迁移动机和决策的微观理论。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家庭策略理论,近些年来也被称为“新迁移经济理论”(Massey et al., 1993),以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新迁移经济理论是在Todaro概念上的一种延伸,该理论将家庭而不是个人作为研究对象。在新古典经济学里,个体是研究迁移过程的最小单位,而在实际研究中,许多学者发现个人决策往往与家庭有着很大的关联,从而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新迁移理论。这一新方法的最主要观点就是迁移决定不是由孤立的个体所决定的,而是家庭集体决策的结果。迁移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个体预期经济利益最大化,也是为了使家庭收入风险最小化(Taylor, 1986; Stark, 1991)。

在社会科学中,越来越多的研究把家庭作为分析的主体。家庭与个体不同的地方体现在家庭可以通过分散家庭经济来源来分散风险。当本地的经济条件恶化时,在外的迁移人口的收入可以支撑家庭渡过难关。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农村家庭在本地的收入来源较为单一,并且往往没有来自于政府的风险保障,或者没有购买相关的保险,所以当因天灾造成农产品减产或是因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浮动造成经济损失时,家庭成员的迁移就为他们的家庭提供了一种保障机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非农户家庭来说,如果地区经济恶化,失业率上升,或者家庭成员生病受伤不能继续工作,家庭的生存可能会受到威胁。在发达国家,政府有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劳动力及其家庭提供风险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失业或是残障保险体系很不完善,或是根本不存在,因此对家庭来说,劳动力迁移是规避生产和收入风险的重要策略(Fan, 2009),即使在设有城乡收入差别的情况下,迁移也有可能发生。

新迁移经济理论还认为迁移决策是基于家庭在迁出地的相对贫困地

位(relative deprivation)而不是绝对贫困,家庭迁移人口不仅在绝对意义上帮助提高家庭收入,而且同样提高了其家庭在当地社区中相对的社会经济地位(Stark and Taylor, 1989, 1991; Stark, 1991)。相对贫困是由一个家庭在社区里收入分布的地位所决定的。家庭的收入越低于社区的平均收入,其相对贫困的感受越强。因此,处在收入分布底层的家庭比上层的家庭更可能迁移。收入分布不均衡的地方比均衡的地方更容易迁移。因此迁移预期收入的增加在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下对迁移行为的影响是有差异的(Massey, 1995)。Stark和Taylor(1991)检验了相对贫困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预测墨西哥国内的人口迁移。他们假设国内迁移在降低相对贫困上的效果应该不佳,因为存在一种叫做“参照对象更替”(reference group substitution)的现象,即有成员迁移到墨西哥城市的区域的家庭会因为获得的迁移汇款来提高他们在村里的相对经济地位,但是他们也会和居住在城市的墨西哥人相比,因此感到相对贫困。

Findlay(1997)强调家庭迁移中的相互关系,描述了非洲家庭结构和迁移之间相互作用特征:例如延伸家庭(extended family)的存在有利于迁移的进行。Fan等人(Fan, 2008; Fan and Wang, 2008)通过对中国农村到城市迁移的研究也强调了代际劳动力分工对乡—城迁移以及往返迁移(circular migration)持续起到的支持作用。

国内人口迁移的非经济学解释

尽管大量对国内迁移的解释都是基于经济因素上的,不论是从微观还是宏观层面,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重视迁移决策中的非经济因素(Clark and Huang, 2006; Hugo, 2005; Zhao, 1999)。例如Odland和Ellis(1988)发现,潜在的迁移个体有可能会放弃迁移带来的经济利益,以保持家庭完整。

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

“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Dual Labor Market Theory)也被称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Piore, 1979; McGee, 1982; Harris and Todaro, 1970)。该理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城市里存在双重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一个是正规部门的高级劳动力市场,另一个是非正规经济部门的次级劳动力市场。这两个部门的产业组成以及劳动力需求是有差别的。高级劳动力市场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对劳动

力的教育水平以及技术能力要求较高,工作薪水高,工作稳定,环境优,社会福利好。而次级的劳动力市场则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低薪水、不稳定的工作条件,恶劣的工作环境,缺乏发展前景以及社会保障是其特征;工作性质则是城里人不愿从事的危险、笨重的体力劳动。高级劳动力市场往往被具有相对较高人力资源的城镇本地居民所占据,次级劳动力市场对他们缺乏吸引力。而从落后地区迁入的迁移人口,教育程度低,缺乏技能,因此只能在次级劳动力市场谋生,填补本地劳动力的社会经济体制内部的结构性空缺。具有市场技能和文化程度较高的迁移人口有更多的机会在城市的正规经济部门里找到一份收入较高的工作,但是这一类型的迁移个体在迁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因此即使农村移民通过进城增加了收入,仍然被限制在边缘行业(Yap, 1977)。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强调现实中城市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为农村迁移劳动力创造了工作机会。该理论也经常用于国际人口迁移并对其有较强的解释力。

实证研究上, Dickens 和 Lang (1988) 的模型结果显示,高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能从工作经验中获得人力资本的提高,包括经验、技能和教育方面,而次级劳动力市场则无法提供人力资本的回报。他们还发现,高级和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分配很大程度上是由种族决定的。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因为非经济原因被排除在高级劳动力市场之外。

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的优点体现在从社会经济体制方面来分析人口迁移的结构性问题;它同时强调了人口迁移在解决城市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上的重要性。通过该理论,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时候,市场上仍存在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该理论的主要缺陷是它单纯从宏观结构造成的劳动力需求方面来解释人口转移,缺乏从供给方面看待人口迁移。

家庭生命进程理论

Rossi (1955) 最早将这一理论运用到解释人口迁移行为上。生命进程理论认为:人口迁移是对与年龄特征相关的家庭人口学转换的一种反应(Clark and Withers, 2007)。迁移行为的原因和后果起源于生命进程中家庭和社会经济地位的转换。一个人在家庭生命过程中所经历的上学、工作、购房、结婚、生子、离婚、退休等一系列生命事件,其中每一件都可能作为诱因导致迁移。迁移与个人以及家庭的生命进程密切相关,很多研究都注重于家庭生命进程对迁移决策的影响。

不少的人口学实证研究都关注了已婚家庭迁移对妇女工作和收入的

影响。文献总体显示,迁移之后,已婚妇女找到工作的几率降低,收入降低,这种状况有时会持续几年(Mulder and Van Ham, 2005; Clark and Huang, 2006; Greenwood, 1997; Mincer, 1978)。即使妻子比丈夫更具收入提升的潜力,家庭迁移后还是让丈夫的收入得到提高,妻子的收入维持不变。这体现了家庭迁移决策更多的是建立在性别角色(gender role)而不是人力资本的基础上(Cooke, 2003)。家庭迁移对已婚妇女就业和收入影响还取决于她们的母亲角色。如果她们没有孩子,迁移对她们的职业只具有较小、短期的影响,就业没有影响。相反的是,有年幼孩子的母亲在家庭迁移之后会经历较长的就业和职业的下滑期(Cooke, 2001)。此外,婚姻对迁移具有反向作用(Graves and Linneman, 1979; Sandell, 1977),例如 Mincer (1978) 认为家庭纽带对迁移有阻碍作用,因此未婚个体比已婚家庭更易迁移。Satu Nivalainen (2004) 同样得出家庭生命周期和迁移之间的强负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迁移主要是由丈夫职业需要引起,妻子是被动的迁移者;双职工家庭迁移率低。但在 Bartel (1979) 的模型中:婚姻状况却对迁移倾向不起显著作用。

在家庭人口增加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上, Sandefur 和 Scott (1981) 研究了年龄、家庭和就业变量对美国战前出生的人口年龄群县际、州际之间人口迁移的影响。他们的分析显示,迁移率和家庭成员数成反比,产生的原因是随着家庭成员数的上升,迁移的经济成本也随之上升。同时,增加的家庭成员也意味着与迁出地更多的联系需要割断,在迁入地需要建立更多的新联系。White 等人(1995)通过对秘鲁生育和迁移的相互作用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平均来说,生育有降低迁移率的作用,家庭越大,迁移的可能性越小。原因也是因为大家庭的迁移费用较高,尤其是对有学龄儿童的家庭。有学龄儿童的家庭其迁移趋势显著下降(Mincer, 1978; Sandell, 1977)。但另一方面, Lindgen (2003) 利用瑞典的注册数据研究了城—乡迁移的决定因素,结果显示生育提高了流向乡村的迁移率。原因是迁移家庭认为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是从城市搬到环境优美的乡村的最好时机。Kulu (2007) 也在奥地利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一般来讲,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的诞生降低了家庭从一个社区搬到另一个社区的几率,但却显著提升了夫妻从大城市搬到乡村的可能性。

由于人口迁移的定义在于迁移行为发生在一个既定的时间段,所以生命进程的变量是在一个时间横断面上进行分析的。更全面的分析方法要求将迁移作为在连续时间段内的一个事件来加以研究。不幸的是,记

录生命历程以及迁移历史的数据非常有限。Sanefur 和 Scott (1981) 利用回顾性生活历史信息的数据研究了工作和家庭生活周期对迁移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在把与之相关的变量进行控制之后, 年龄和迁移之间的逆相关性就消失了。

社会网络理论

网络理论也称社会资本理论, 认为迁移行为并非只受宏观经济作用的影响, 强调社会资本在人口迁移行为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迁移的每一个环节(决定是否迁移、向何处迁移、如何适应迁入地生活等)都与迁移人口的社会资本密不可分。迁移网络实质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 其纽带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等基础之上。这一系列联系被视为可以降低迁移成本、增加迁移收益和减少迁移风险, 从而增加迁移的可能性。当大量的迁移者在迁入地定居时, 就可能形成迁移网络, 这就为以后的迁移提供了一种惯性, 并且由于网络具有累积性的特征, 前一次迁移是后一次迁移的资源, 新的迁移又导致网络的扩大和进一步发展, 促使迁移的持续进行和规模的扩大。

最早期的迁移者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可以利用, 所以对作为开拓者的他们来说, 迁移成本较高, 同时面临失业的风险。当早期的迁移者在迁出地安置下来后, 对其在迁出地的亲戚和朋友来说潜在的迁移费用就会降低很多。每一个新移民都在迁入地有通过亲戚朋友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一旦社会关系在迁出地累积到一定程度, 外迁就会持续不断。因为每一次新的迁移都构建出新的社会网络, 并降低了潜在的迁移费用, 引起迁移者社会关系网上亲戚与朋友的新迁移, 随后进一步扩大了迁移网络, 降低迁移费用, 形成“链式”迁移。

迁移网络同时也起着分散风险的机制。当迁移网络发展起来之后, 工作信息会通过网络传回迁出地, 减少了后续外迁的盲目性, 保证了后续迁移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来源。因此自我维持的社会迁移网络扩张也能从理论上解释为通过持续不断地降低迁移风险而实现的。每一个新移民都有助于扩张迁移网络, 降低随后迁移者的风险以及成本 (Massey and Espinosa, 1997)。

社会迁移网络理论在解释国际以及国内迁移上都得到有效的利用, 例如 Massey 等人 (1987) 通过对墨西哥农村社区的数据的分析, 研究了社会迁移网络的动态机制与个人的迁移决定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 如果父母有迁移美国经历的, 子女迁移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 如果村里

大部分人去过美国, 则人们的迁移率也会提高。与国际迁移类似, 社会关系网络对国内迁移也起着重要作用, 不少对中国国内乡—城迁移的研究都印证了这一点 (Chan et al., 1999; Rozelle et al., 1999)。例如, Zhao (2000) 在其研究中揭示, 几乎过半数的自发迁移人口在第一次迁移时得到亲戚和朋友的帮助。他的结果还显示, 迁移历史长的村庄人口迁移趋势大于迁移历史短的村子。Meng (2000: 175) 则在他的研究中发现, 多于 70% 的乡—城迁移人口是通过亲戚、朋友或同乡找到他们的第一份工作。Fan (2008: 72) 通过对四川和安徽访谈数据的分析发现, 社会关系网是超过半数的进城务工人员选择迁移目的地的主要原因。

除了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机会, 迁移网络还对提高迁移动力的经济收益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迁移关系网中, 与迁移家庭的社会关系不仅会增加迁移者本身的小时工资, 而且可以获得更长的工作时间, 从而大大提高其月收入。此外, 家庭社会网络也对人们的迁移决策和流动性起到重要作用, 例如双职工家庭在选择居住地上会考虑年迈父母的需要, 以及老人对双职工及孩子所能提供的经济文化资源。这种代际联系会影响到家庭迁移的范围 (Bailey et al., 2004)。Mulder (2007) 则认为, 基于亲戚关系的家族影响到人们居住地的选择。家族对家庭的影响力是造成家庭低流动性和不愿长距离搬迁的主要原因。

作为对人口迁移非经济学的一种理论, 社会迁移网络结合了个人家庭微观决策和宏观社会结构来研究迁移的机制, 其对理解迁移人口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女性学解释

在人口迁移理论中, 最早提到男女迁移差异的是 Ravenstein。他在对迁移规律的总结中指出, 相比男性, 女性更趋向于短距离迁移。但随后的有关人口迁移的理论发展, 却大都忽视了性别因素在人口迁移中的作用, 只是笼统地概括为男性比女性更具流动性, 迁移目的地更分散, 以及具有更多的就业机会。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 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兴起, 西方的人口迁移研究也开始注重从女性主义视角看待人口迁移问题, 形成了女性主义迁移理论 (feminist migration theory), 并从女性迁移的特点、生存状况、性别歧视在家庭和就业中的表现形式及其深层的社会、经济或制度原因等, 解释人口迁移中的性别差异。最近的女性学研究认为, 家庭内部性别和代际权利等级结构能帮助解释女性和男性的

流动性差异 (Chant and Radcliffe, 1992; Hondagneu-Sotelo, 1994)。而女性和男性在家庭 (户) 内部劳动分工的角色差异是造成他们流动模式差异的主要原因 (Lawson, 1998)。

女性学迁移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描述基于实证结果下的家庭 (户) 内部的性别不平等性; 也着重于解释产生这些不平等性的机制 (Carney and Watts, 1990; Hart, 1992)。例如 Lawson (1998) 在拉丁美洲人口迁移问题上, 强调了在理解谁去迁移和有什么样的后果问题上家庭内部权力关系和动态机制的核心性。区别于家庭策略迁移理论, 女性主义迁移理论下的家庭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户主为男性的单一概念, 而更多关注家庭组成上的差异, 例如女性户主、男性户主、延伸家庭、核心家庭等不同形式的家庭组成, 以及这些不同家庭组成本身作为理解迁移动机和影响的重要原因。

除了扩展家庭的概念外, 女性主义迁移理论还重新检验了地理尺度和家庭概念的联系 (Hart, 1992; Staeheli and Lawson, 1995)。家庭的传统概念决定了其空间和形式上的本地性。这一假设直接导致家庭是迁移的衍生物的概念, 即家庭是形成在迁出地或迁入地离散分布的一个个单位。女性主义的视角则拓宽了这种概念, 家庭 (户) 可以是由分散在各地的家庭成员组成的跨越地区的组成单位, 各地的成员即使不住在同一屋檐下, 仍然通过经济上的贡献以及对家庭重要决策的影响力保持作为家庭的一分子 (Fan, 2006; Lawson, 1998)。

此外, 性别因素还是决定迁移社会关系网的重要方面。实证研究显示, 社会关系是建立在性别基础上的, 迁移个体的性别以及家庭和社会资本的性别基础都对迁移结果起到决定作用 (Curran and Seguy, 2001)。Kanaiaupuni (2000) 通过分析男性和女性的第一次迁移经历, 得出家庭社会关系对妇女的第一次迁移更为重要。此外, 村里的社会关系则对男性的第一次迁移有更显著的影响, 社会关系中女性的比例正向地影响女性的第一次外出但却负面地影响男性的迁移。Cerruti 和 Massey (2001) 发现母亲的迁移经历提高了儿子和女儿的迁移可能性, 但这种影响对于女儿更为显著。利用墨西哥的数据, Curran 和 Rivero (2003) 的研究显示, 性别关系引起的迁移导致了男女迁移结果的差异。例如, 他们发现家庭里女性成员的国内迁移经验有助于男性和女性随后的迁移, 而女性成员的国际迁移经验仅有助于其他女性的迁移, 对男性的迁移没有帮助。男性的国内迁移经验对男性和女性的迁移都没有影响, 但却对男性国际迁移趋势有显著的影响。

在大多数的婚姻迁移研究中, 女性都被认为是被动的迁移者, 她们是因为婚姻的纽带而随着丈夫迁移 (Bonney and Love, 1991; Fincher, 1993)。但这样的结论却忽略了女性在婚姻迁移中具有能动性地位。例如不少女性把婚姻当作迁移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结果, 她们通过婚姻实现迁移的目的, 以追求更好的生活、经济保障和个人的独立 (Walby, 1990; Ortiz, 1996; Fan and Huang, 1998)。Riley 和 Gardner (1993) 发现, 在很多社会, 婚姻是原生家庭改变经济状况的一种策略, 而女婿的所在地在该策略中尤为重要。Watts (1983) 研究了尼日利亚的农村女性希望嫁给城里人的愿望。Fan 和 Li (2002) 研究了中国广东两个村庄的婚姻和劳动力迁移的关系, 得出婚姻是农村妇女搬到优势地区的一种手段, 而不断壮大的劳动力迁移则帮助扩展了农村女性的婚姻市场。

女性主义在近期对人口迁移的研究中开始更加偏向于性别 (gender) 而不局限于女性本身, 并且人口迁移学者开始认为人口迁移是一个性别化的过程, 需要更复杂的理论和分析工具, 而不仅仅是研究性别角色, 或者像过去那样将性别作为一个二分变量 (Donato et al., 2006)。因此, 人口迁移研究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比较男女迁移模式、原因和意义的差别; 而更侧重于把性别作为构建权利和差异的一种方式及其如何影响人们的流动性 (Hugo, 2007)。

迁移人口特征和选择性

迁移人口特征和选择性 (selectivity) 帮助回答谁是迁移者的问题。迁移人口并不是随机地分布在人群中, 他们具有区别于非迁移者的特征, 主要体现在人口学特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这些特征通常直接或间接地和个人收入相关, 从而影响迁移决策和迁移的后果 (Botjas, 1987)。由于迁移人口的选择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迁移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影响, 因此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Fan, 2009)。Lee (1966) 认为, 迁移是具有选择性的, 选择的类型各异, 被迁入地吸引的迁移者往往具有正向的选择性, 而被迁出地排斥的迁移人口则往往具有负向的选择性。把迁移者归在一起总结, 选择则往往具有双向性。

年 龄

年龄是人口迁移选择性中研究最多, 并具有基本共识的参数。总体来说, 年轻的成年人具有较强的迁移倾向。从生命周期角度来看, 青年

人处在生命周期生命事件较为集中的年龄段,例如外出求学,毕业工作,结婚建立家庭,因此导致迁移频繁。从预期成本来看,青年人迁移的机会成本较小,他们不是单身就是刚刚组建家庭,具有更多的自由性。而且他们的事业也刚刚起步,其在劳动技能和工作、人际环境等方面的变化均不会带来太大的损失,同时其预期收益则比年轻人来说要高,因为他们的发展机会和空间更大,机会收益也更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迁移人口的年龄高度集中在20~35岁之间。Greenwood(1985)用迁移与年龄的关系解释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内区域间的迁移模式。战后美国出生的“婴儿潮”在70年代进入到迁移高峰的年龄段。而美国东北地区在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早期因经济衰退,就业机会大幅下降,相比老工业区的高失业率和不甚乐观的工作前景,美国西部和南部的就业机会增长迅速,经济发展较快。大量处于迁移高峰年龄段的人口,加上经济和工作机会原因,导致了大批向西部和南部的劳动力人口迁移。

对年龄和迁移关系更为详细的阐述体现在 Andrei Rogers (1978) 的年龄—迁移率理论模型。根据他的理论,在生命转变的过程中有三个迁移高峰:即儿童早期、进入劳动力市场初期和退休三个年龄段。儿童的迁移率较高,这是因为他们跟随还未安定下来的父母一起迁移,随着年龄的增长,迁移率逐渐下降。到了青少年时期迁移率又会逐渐上升并在20~30岁达到顶峰,其中迁移的原因包括离开上大学,找工作,结婚。过了这个顶峰之后,迁移率缓慢下降,直到人们退休又会出现迁移的一个小高峰。因为退休人口希望能搬到气候较好、生活环境舒适、生活费用低,或是离子女近的地方度过剩下的岁月。该理论深入地从年龄结构为研究人口迁移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支持,并对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和迁移人口年龄结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之后 Andrei Rogers 等基于年龄和迁移的关系发展了用出生地婴儿人口数据来推断地区之间各年龄组的迁移倾向,在缺乏人口迁移数据的情况下,利用婴儿迁移倾向估计人口迁移具有很大优势。该方法最早应用于美国4个人口普查地区间人口迁移数据,模型预测结果较为理想(Rogers and Jordan, 2004),研究显示了婴儿迁移倾向是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其他年龄组迁移倾向的指标。该方法随后又被应用于区域间人口迁移数据不是很精确的国家,例如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来验证模型的有效性(Rogers et al., 2007)。近期该方法通过利用美国9个空区分区5次人口普查的区域间人口迁移数据的实践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改进

(Rogers and Jones, 2008)。婴儿人口数据方法依赖于实证观察中各年龄组人口呈现的迁移倾向的规律,采取5个步骤:(1)确定各年龄组人口迁移的规律性;(2)确定具有相似年龄结构的迁移家庭;(3)利用7~11个参数模型去除观察到的不规则性数据;(4)发现和除去异常值;(5)随后用过去数据观察到的规律性的对各年龄组迁移流进行估计和预测。

教育

尽管有大量关于国内迁移和教育选择性的研究,但对于教育选择性本质却还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结论,多数人认为迁移倾向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上升。Todaro(1980)认为:“迁移者往往并不是人群中一个随机的样本。相反地,他们不成比例的年轻,具有良好的教育,恐怕承担风险,更希望取得成就,并且与迁入地的当地人相处更好。”Williamson(1988)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对比研究中发现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地区的“智力外流”(brain drain)现象,认为“流入城市的那些迁移者不仅年轻,而且可能也是农村劳动力中最优秀和聪明的部分”。一系列关于美国和加拿大国内迁移的研究显示,迁移人口比迁出地的未外出人口具有更高的文化程度,并且他们在迁出地就业,工资也会高于未外出人群(Baily, 1993; Gabiel and Schmitz, 1995)。

另一方面,很多迁移者是没有技术、家里没有多少土地的贫农。例如 Singh 和 Anayetei (1996/1997)发现,在布基纳法索,缺少土地的人更倾向于迁移。Todaro(1980)记录了在非洲许多地区普遍存在的“辍学”(school leaver)迁移者现象。Walker(2008)对美国年轻人迁移行为的调查结果显示,教育和迁移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U形,即有高中教育程度的年轻人迁移比例最低,而有大学或者高中以下学历的年轻人迁移率更高。

在一个家庭里面,丈夫的教育程度与迁移的距离成正比(Mincer, 1978; Sandell, 1977)。至于妻子的教育程度与迁移的关系:实证研究则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些研究结果表明,妻子的教育程度对迁移率没有显著影响(Axelsson and Westerlund, 1998; Nivalainen, 2004),而其他实证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妻子的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了迁移的倾向性(Holmlund, 1984; Shields and Shields, 1993) Markham 和 Pieck(1986)总结了迁移倾向和就业特征之间的关系。教育程度、职

业级别和迁移倾向总体具有正相关性,而配偶的就业状态和教育程度则与迁移倾向具有负相关性。

性别

任何一概而论阐述性别和迁移的关系都可能失偏颇。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系具有较强的区域性差异(Weeks, 2007)。Findley(1999)发现,在拉丁美洲,妇女迁移人口的比例要高于男性。这有可能和不断提的妇女地位相关,但大多数妇女的迁移是跟随丈夫或者家人的。迁移妇女的就业机会有可能在增长,但不少工作都是性别分隔的(gender-segregated),如家政服务、娱乐以及性服务是迁移妇女从业的重要行业(Hugo, 1999)在发达国家,妇女基本和男性具有相同的迁移率。这是因为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女性可以自主迁移而无须依附于家中男性的迁移。妇女的迁移率与她们的社会地位相关,在妇女地位相对较低的亚洲和非亚洲,男性的迁移率高于女性,在欧美国家以及拉丁美洲,妇女地位相对较高,女性和男性的迁移率相当,甚至更高(Radcliffe, 1992)。但是对已婚女性来说,即使是在美国,女性的迁移率也低于男性。不连续的就业、较低的升迁机会、低于丈夫的工作收入、家庭责任都影响她们的迁移倾向(Markham et al., 1983)。而Halfacree(1995)则将美国已婚女性在迁移中的从属地位以及因随家庭迁移而在事业和经济上的损失归结为广义结构的父权歧视(patriarchal discrimination)。Todaro(1980)的研究也显示,迁移者的性别选择性在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模式。在亚洲和非洲迁移者以未婚男性为主,在拉美地区迁移者以未婚女性和已婚男性为主。而且即使在同一地区,内部情况也不尽相同。而Andrew Menefee Singh(1984)的研究显示,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部,女性迁移的模式也会有差异。通过对印度女性迁移的研究,她发现印度北部女性的迁移率低于南部,地方文化传统因素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迁移人口中,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未婚女性来说,迁移是提高她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摆脱社会所赋予她们的传统角色的契机。

但总的说来,由于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自身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制约,女性在劳动力迁移与就业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就业、劳动条件、劳动报酬等多方面受到制度性和社会性歧视。

迁移人口和回迁人口的选择性

尽管结论并不是完全一致,但是不少研究结果都表明迁移人口,尤其是初次迁移的人员具有正向的选择性。相比迁出地的非迁移人口,他们年轻,教育程度较高,并具有冒险精神。但是当最初的迁移者在迁入地安置下来,并为随后的迁移人口建立起社会关系网络之后,迁移的选择性也随之下降(Massey et al., 1993)。这是因为迁移社会关系网络降低了迁移的成本和风险,因此可以让选择性差的人们也加入到迁移人口中来。Massey等根据19个墨西哥社区的研究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迁移流变得更加多样化,并开始与迁出地的人口特征相似。通过研究福建移民的社会经济水平, Liang(2001)认为随着时间的增长,迁移人口的年龄开始下降,教育程度减低,女性比例上升。

此外,对于有过第一次迁移经历的人,他们随后迁移的可能性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之前的迁移经历和其他移民之间的社会联系,而不再与个人和家庭特征相关。随着时间推移,迁移的决策越来越多地与迁出地的社会经济条件无关,而由迁移积累的人力资本和移民网络中积累的社会资本等因素所决定(Massey, 1987)。

而关于回迁人口的选择性,其争议性远甚于外迁人口。有些研究认为,城市一乡村回迁人口在迁移人口中是负向选择的,他们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技能,年龄更大,因此很难在城市里找到工作并适应城市生活(Borjas, 1989; Lec, 1984; Newbold, 2001)。“城市总是将不适合城市生活的移民拒之门外,而留下那些有技能和适应性强的” (Simons and Cardona, 1972: 168)。但是由于回流人群的人力和社会资本在她们外出时,相对于迁出地往往是具有优势的,因此不少人认为回流人群的选择性低于继续留在迁入地的经济迁移人口,但高于迁出地的从未外出人口(Chiswick, 2000; Wang and Fan, 2006)。

而其他的,例如Saenz和Davila(1992),则根据美国国内西南部西班牙裔的迁移模式得出回迁人口具有正向选择性的结论。他们比他西班牙裔迁移人员更容易回迁,因为他们更具有能力对劳动力市场做乐观的预测并对有利的经济形势做出反应。Long和Hansen(1977)关于黑人返回美国南部的研究也表明外迁和返回都青睐于教育程度高的。

而Borjas和Zbratsberg(1996)在理论上是这样解释回迁人口选择性的:如果回迁人口在外迁时是正向选择的,那他们在外迁人口之中就

是最差的；反之，如果回迁人口在当初外迁时是负向选择的，那他们则是外迁人口中最强的。Ramos (1992) 通过研究美国的波多黎各移民，证实了这一理论。他发现来自波多黎各的迁移人口通常都是负向选择的，但是回迁的人员则是其中具有最多技能的。

人口迁移研究方法

在人口迁移的研究上，大量实证研究是基于大规模的统计资料上的，而迁移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和经济过程，也是一个空间过程；因此也发展出了一些经典的人口空间计量模型。但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口迁移研究开始强调作为迁移决策者的个体经验，重视从个人生命历程来探索迁移人口整体经验的研究，其中较典型的就是民族志方法。

人口迁移空间计量模型

人口迁移计量模型主要运用于预测人口迁移量和地区间的人口变化及人口重新分布。在实证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各类不同的国内人口迁移模型，以下介绍其中较经典的模型及其最新的发展以及它们的应用。

(一) 净迁移模型

净迁移模型在人口预测中较为常用，易于理解，也经常出现在人口学教科书中。不少国家都利用该模型进行人口预测及分析区域间人口变化。例如，澳大利亚曾用净迁移模型进行省和区域人口的预测 (Bell, 1992)。英国政府精算部门用该模型进行官方的人口统计 (GAD, 2002)。新西兰的统计局也是用它来预测官方区域人口 (Wilson and Bell, 2004)。净迁移模型尤其适用于稳定的人口结构。空间人口分布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区域之间具有相同吸引力的平衡基础上的 (Roback, 1982)；如果地区之间的吸引力存在差异，净迁移就会流向具有较大吸引力的地区。只要地区的自然增长不超过净迁移量，整个系统趋向于一个稳定的人口分布状态 (Greenwood et al., 1991)。净迁移模型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NM_{i,t+n} = (P_{i,t+n} - P_i) - (B_{i,t+n} - D_{i,t+n})$$

在此模型里， $NM_{i,t+n}$ 代表 t 到 $t+n$ 时间段的净迁移量， $P_{i,t+n}$ 是 $t+n$ 时间点的人口， P_i 是 t 时间点的人口， $B_{i,t+n}$ 是 t 到 $t+n$ 时间段的出生人口，而 $D_{i,t+n}$ 是 t 到 $t+n$ 时间段的死亡人口。模型解读为：一个地

区某时间段的净迁移量是该地区在该时间段的人口增长和自然增长的差值。

净迁移模型的优势在于其数据需求量小，往往可以直接利用人口普查数据。该模型可以应用于不同的时间尺度；此外还可以结合其他的参数，例如人口密度、就业、社会等级等进行分析。由于具有以上的优点，净迁移模型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另一方面，该模型的缺陷也很明显。从理论上来说，没有“净迁移人”的说法，此外净迁移模型模糊了总迁移量和迁移流向之间的关系 (Rogers, 1990)，并且不能有效揭示个人层次的人口迁移过程 (Morrison, 1977)。净迁移的计算依赖于地区的界限、边界的改变会导致净迁移量的变化。所以该模型多用于小空间尺度，例如县级人口迁移研究。另外，人口净迁移代表了一个地区迁出和迁入的人口差值，模型没有将迁出地和迁入地人口特征、年龄结构变化、地理分布等影响迁移趋势的因素考虑进去 (Wilson and Bell, 2004)。

(二) 人口重力迁移模型

人口重力迁移模型是建立在物理学的牛顿重力公式基础上的。该模型着重于空间相互关系，力图用距离、迁出和迁入地特征来预测两地之间的迁移人口。最简单的人口迁移重力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M_{ij} = k * (P_i P_j / D_{ij}^2)$$

在此模型中， M_{ij} 是从 i 地到 j 地的迁移量， P_i 、 P_j 分别是 i 、 j 两地的人口规模， D_{ij} 为 i 、 j 两地的距离， k 是模型系数。该模型表明人口迁移量与两地人口规模的乘积成正比，与两地之间的距离平方成反比。其中代表两地人口规模的变量也可以扩展，加入社会经济变量。

大多数空间关系模型都着眼于对迁移的过程本身很复杂，很少用之行迁移预测，这是因为迁移的过程本身很复杂，并且需要的数据量大；尤其是引入社会经济变量之后。此外，空间关系模型中的参数也需要预测，并很可能比预测人口变量难度更高 (Wilson and Bell, 2004)。但是迁移重力模型非常容易理解，所以也有人尝试用经过改进的模型来预测迁移。Courgeau (1995) 的方法就是如此。在他的模型中，迁移量只和迁出及迁入地的人口规模相关，与距离无关。最后的结果就是人口增长的地区会吸引更多的迁移人口。外迁人口与迁出地的人口规模之间不是一个固定的比例，该比例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长。其他对人口迁移重力模型的改进尝试则包括增加变量，例如将两地的失业率、城市化

程度、气候因素、税率等因素加入到模型中去,或者加入能够间接反映迁出地人口特征的变量,像平均年龄、平均教育程度等指标,改进后的迁移重力模型在人口迁移的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因为它们将重力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行为因素,并为之后基于微观数据上的研究而发展起来的迁移决策模型奠定了基础(Greenwood, 1997)。

不过因为使用的是整合(aggregate)数据,即使是经过改进的人口重力迁移模型也不能揭示出迁移的种类,比如迁移行为是初次、回迁或是重复进行的,或者解释不同人群的不同迁移原因。

人口重力迁移模型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是距离,即两地之间的迁移量和距离具有反相关性。这是因为距离和迁移的交通成本以及机会成本成正比(Wadychki, 1974),和信息成本及心理成本也成正比(Schwartz, 1973)。但是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更新,距离对迁移的影响力也随之下降,例如在城市化高、经济发达的地区,距离早已不是迁移过程中的重要障碍(Mueser, 1989)。

(三) 多区域人口迁移模型

多区域人口迁移模型的发展在净迁移模型之后。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过人口学者的努力,人口预测方法取得较大进展,发展了多区域人口迁移模型(Rogers, 1966; 1975; Rees and Wilson, 1973; 1977)。与净迁移模型相比,多区域人口迁移模型有两个优势:第一是该模型可以估测多个地区和地区间的迁移流,因此避免了净迁移概念上的限制。此外,该模型可将各个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的迁移流量与社会经济因素联系起来,包括迁移人口的特征,例如年龄和性别、迁出地与迁入地的社会经济指标、地理因素等。

多区域人口迁移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begin{aligned}
 P_{i,j,s,t} + 1(t,t+1) &= P_{i,j,s,t} - D_{i,j,s,t} + \\
 & 1(t,t+1) - \sum M_{i,j,s,t} + \\
 & 1(t,t+1) - E_{i,j,s,t} + \\
 & 1(t,t+1) + \sum M_{j,i,s,t} + \\
 & 1(t,t+1) + I_{i,j,s,t} + 1(t,t+1)
 \end{aligned}$$

模型中: P 是人口矢量, M 是国内人口迁移矩阵, D 是死亡人口矢量, I 是国际迁入人口矢量, E 是国际迁出人口矢量, t 是年份,下标 i 是输出区, j 是输入区, s 是性别, a 是年龄组别。该模型将年龄性别结构以及人口的地理分布都包括了进去。

多区域迁移模型的主要局限性体现在其对数据量的要求较高,人口迁移矩阵内所包含的变量较多,得到一个完全的包含有迁出地和迁入地并具有年龄性别结构的迁移矩阵的成本较高。为了克服多区域模型的限制,一般有两种策略可以降低数据量:第一是应用一个缩减过的多区域模型;第二是在建立迁入地迁出地之间的具有年龄性别结构的迁移矩阵时,用部分数据反映全体(Wilson and Deil, 2004)。具体压缩数据的方法包括将数据整合(Rees, 1997),例如将一年间隔的年龄数据压缩成五年间隔的;或将数据分割,例如将模型分成几个有联系的半独立的子系统。

民族志研究方法

在对人口迁移的研究方法上,尽管传统的人口迁移模型和大规模统计数据的运用占研究的主导地位;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强调作为决策的个人,例如Oden(1999)认为:人口迁移研究方法上应更注重人口迁移过程中的微观层面,并强调应以以人为本的方法从具有决策能力的个体方面来探讨迁移者的经验,或者是认同问题。在近几年的人口迁移研究中,关注个人经验的民族志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在利用民族志方法研究人口迁移的文献中,大多数着重于多样化的和相互连接的单元的分析,例如,家庭、家族和大的社会关系网络(Mahler and Pessar, 2006),因为个人的迁移和他们对家庭的贡献无一例外地是与大的社会单位紧密相连的(Boyd, 1989)。

例如McHugh(2000)以民族志的方法进行人口迁移研究,他认为民族志的研究在显现移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具有明显优势。他在研究中探讨了退休老人的季节性迁移、移民与地方的联系,以及生命历程的轨迹。Rouse(1991)也强调民族志的重要性;他认为利用民族志研究人口迁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解释空间、归属与连接的方式。他认为利用民族志方法研究人口迁移,人们能更清楚地了解通过人口迁移过程所产生的社会动态性,并且认识到现代的空间是由社会所构建的。

Rachael Silvey(2000)通过对迁移者的深度访谈,分析了在印度尼西亚经济危机条件下流动性性别化的身份如何相互作用。她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流动性如何受社会构建下的性别标准和识别的影响和作用,同时进一步解释了在变化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两者是如何再造和转换的。她的研究说明,尽管女性迁移者渴望外贸加工区的一份独立工作,她们却

受到迁出社区成员对她们道德和女性角色的挑战。这种冲突导致一些迁移女性又回流到迁出地,也因此中断了妇女劳动力流动对工业发展的贡献。

Lawson (2000) 同样也关注迁移人自身的经验; 她认为迁移人口的经验是一种社会建构, 并且发生在特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背景下。她的研究是要检视性别与族群的社会关系如何塑造他们的经验。她认为探讨迁移者本身所述说的丰富的故事, 不只是独特的个人经验, 更是被性别、阶级、族群以及移民的社会关系所影响, 这可以展现主体位置的多样性 (在性别、阶级和族群交织之中) 以及他们如何从这些位置上以特别的方式去解读现代性, 所以迁移人口的故事也具有理论上的意义。此外, 他们的经验也透露出某些矛盾的事实, 而这些矛盾的声音在中规中矩的论述中是发现不了的。这显露出差异的重要性, 了解差异可以让我们从迁移者的立场进行分析。这对于更全面地了解迁移过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人口迁移和地区发展

人口迁移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很久以来就是人口学家关心的一个课题。过去大家一直认为人口迁移对输出地的影响多为负面效应, 因为输出地失去了教育程度和技能最高的人群, 这种智力流失 (brain drain) 对输出地的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近些年, 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迁移对输出地的发展也可以起到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体现在迁移汇款、教育投资、商业投资和迁移人口回流几个方面, 例如, 不少学者通过调查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和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变化之间复杂的关系, 揭示了人口迁移对迁移者和输出地都具有成本和收益的作用 (Skeldon, 1997)。Lowell 等人 (2004) 用智力应变 (brain strain) 一词来形容当代技术移民如何对发展落后的输出地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他们建议智力应变是一个更加贴切的用语, 因为它提示输出地和输入地之间复杂的人口流动格局, 以及更复杂的正面和负面效应。Beinec 等人 (2001) 认为对输出地最终的影响取决于正面和负面影响哪一方面起到主导作用。还有研究表明, 政策在人口迁移对输出地的影响方面关系重大。例如 Stark (2005) 认为设计良好的人口迁移政策对迁移输出地有智力流入 (brain gain) 的作用而不仅仅是智力流失, 并且还能导致对所有劳动力社会福利的增加, 包括迁移者和非迁移者。Spaan 等人

(2005) 也认为政策在输入地和输出地对迁移的干预会加强正面效应, 减轻负面效应。

对于人口迁移和发展较为全面的论述体现在 Bailey (2009) 的一篇有关“人口迁移和发展联系”的回顾文章中。他在文中总结了当代人口迁移和发展关系的六个特征。尽管有些总结是基于国际人口迁移的研究, 但是对国内人口迁移在某种程度上同样适用。这六个特征是: 第一, 人口迁移和发展之间的联系是正面的。人口迁移所带来的经济汇款能产生发展所需的各种相关收益。第二, 返回到迁移地的有经济和非经济资源的流动, 包括金钱、知识和技能交换 (Nyberg-Sorenson et al., 2002a; 2002b)。第三, 促进经济汇款的力度, 并通过更多样化和更灵活的人口迁移形式, 例如短期迁移、回流迁移、循环迁移和跨国迁移来实现人口迁移带来的收益。第四, 多样化人口迁移和资源回流所带来的潜在利益需要通过协调不断增加的行为者 (agents) 的活动才能最有效地达到。主要的参与者包括: 迁移者本身, 社会关系网, 家庭和跨国国家家庭, 社区, 家乡联谊会, 职业团体, 侨胞信息网络, 地区和国家政府, 国际组织 (van Hear and Nyberg-Sorenson, 2003)。第五, 尽管人口迁移、经济汇款以及人口迁移合作者逐步显示其广度和多样性, 但是针对人口迁移的兴趣和结果却越来越窄, 很多发展政策都是具有明确目标的。例如不少有关人口迁移的政策只针对有限的行业和地区。第六, 如此的目标和定位体现在对此不着边际的表述上, 有时借此来强调“道德恐慌”: 比如国际贫困、丧失主权、劳动力短缺等。

在政策对城市内部人口流动的影响方面, Clark (2005, 2008) 最近对美国机会迁移项目进行了重新评估。机会迁移 (Moving to Opportunity, MTO) 是由美国房屋和城市发展局开展的一项帮助低收入家庭搬入到低贫困社区的项目。政府利用政策的介入让低收入家庭脱离贫困社区, 以期通过政策对居住地点的干涉解决城市内部贫穷和种族聚集问题。通过对参与机会迁移项目的美国黑人家庭的实证研究和社区人口结构在迁移前后的分析, Clark 发现机会迁移项目家庭随后的迁移经常是回到和他们原来社区相似的地方, 有时甚至是回到他们原来的社区。亲戚朋友和社会支持网络在家庭选择居住地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研究结果显示, 该项目虽然在帮助家庭搬离贫困社区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 但也揭示了政策介入在影响人们住房选择和流动性上的局限性。

结 论

尽管西方国内人口迁移研究体系已经较为成熟,发展了丰富的理论从各个学科各个角度去解释人口迁移,但大多数的研究还是偏向于实证研究,并在实证研究中缺乏迁移对迁出及迁入地影响的深入探讨。从研究趋势来看,关注宏观和中观层面上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及转型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以及从微观层面侧重家庭和作为迁移决策人在迁移机制中的作用,仍将在未来主导国内人口迁移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 Axelsson, R. & Westerlund, O. (1998). A Panel Study of Migration, Self-Selection and Household Real Income,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1 (1): 113-126.
- Bailey, A. (2009). Population geographies, gender, and the migration-development nexu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12.
- Bailey, A. J., Blake M. K. and Cooke, T. J. (2004). Migration, care and the linked lives of dual-earner household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6: 1617-132.
- Bartel, A. P. (1979). The migration decision: What roles does job mobility pla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9: 775-786.
- Bell, M. (1992). *Demographic Projections and Forecasts in Australia: a Directory and Digest*.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 Service.
- Beine, M. Docquier, F. and Rapoport, H. (2001). Brain drai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4: 275-289.
- Bonney, N. and Love, J. (1991). Gender and migration: geographical mobility and the wife's sacrifice. *Sociological Review*, 39: 335-348.
- Borjas, G. J. (1987). Self Selection and the Earnings of Immigra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7: 531-553.
- Borjas, G. J. (1989). Immigrant and emigrant earnings: a longitudinal study. *Economic Inquiry*, 27: 21-37.
- Borjas, G. J. and Bratsberg, B. (1996). Who leaves? The outmigration of the foreign-bor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8 (1): 165-176.

- Boyd, M. (1989). Family and personal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new agend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3 (3): 638-670.
- Carney, J. and M. Watts. (1990). Manufacturing dissent: work,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meaning. *Africa*, 60 (2): 207-241.
- Cerrutti, M.; and Douglas Massey. (2001). On the Auspices of Female Migration From Mexico to the United States. *Demography*, 38 (2): 187-200.
- Chan, K. W., Ta Liu, and Yunyan Yang. (1999). *Hukou and Non-hukou migrations in China: comparisons and contras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5: 425-448.
- Chant, S. and Sarah A. Radcliffe. (1992).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Importance of Gender. In S. Chant (ed.), *Gender and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1-29. London: Belhaven Press.
- Chiswick, B. (1999). Are Immigrants Favorably Self-Selecte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 (2): 181-185.
- Clark, W. A. V. (2005). Intervening in the residential mobility process: neighborhood outcomes for low-income popul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2 (15): 307-312.
- Clark, W. A. V. (2008). Reexamining the moving to opportunity study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changing the distribution of poverty and ethnic concentration. *Demography*, 45 (3): 515-535.
- Clark, W. A. V. and Y. Q. Huang. (2006). *Balancing Move and Work: Women's Labor Market Exits and Entries after Family Migration*.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2: 31-44.
- Clark, W. A. V., and S. Davies Withers. (2007). Family migration and mobility sequ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patial mo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life course. *Demographic Research*, 17 (20): 591-622. <http://www.demographic-research.org/Volumes/Vol17/20/default.htm>.
- Clarke, J. I. (2000). *The Human Dichotomy: The Changing Numbers of Males and Females*. Amsterdam: Pergamon.
- Cooke, T. J. (2001). "Trailing wife" or "trailing mother"? Family migration, life-course events, and the labor-market participation of married wome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3: 419-430.
- Cooke, T. J. (2003). Family migration and the relative earnings of husbands and wive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93: 338-349.
- Courgeau, D. (1995). Migration theories and behavioural models. *International Journals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1: 19-27.
- Curran, S. and Abigail C. Suguy. (2001). Migr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A Role for Gender and Social Network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2 (3): 54-77.
- Curran, S. and Estela Riveo. (2003). *Engendering Migrant Networks: The Case of Mexican Migration*. *Demography*, 40 (2).
- Dickens, W. T. and Lang, Kevin. (1988).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the Union Wage Premium.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MIT Press, 70 (3): 527-530.
- Donato, K. M., Gabaccia, D., Holdaway, J., Manalansan, IV, M. and Pessar, P. R. (2006). A glass half full?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Special Issue, *Gender in Migration Studies*, X (1): 3-26.
- Fan, C. C. (2006). 进城返乡: 四川安徽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外出经历与贡献. 见: 蔡昉, 白南生主编. *中国转型时期劳动力流动*.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40-368.
- Fan, C. C. (2008). *China on the Move: Migration, the State, and the Househo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Fan, C. C. (2009). Migrant workers. In Rob Kitchin and Nigel Thrift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89-95. Volume 1. Oxford: Elsevier.
- Fan, C. C. and Ling Li. (2002). Marriage and Migra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 A Field Study of Gaozhou, Western Guangdo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4 (4): 619-638.
- Fan, C. C. and Wenfei Winnie Wang. (2008). The household as security: Strategies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In Russell Smyth and Ingrid Nielsen (ed.), *Migration and Social Protection in China*, 205-243. New Jersey, NY: World Scientific.
- Fields, G. (1975). Rural-urban migration, urban unemploy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and job search activity in LD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 (2): 165-188.
- Fincher R. (1993). Gender relations and the geography of migrati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5: 1703-1705.
- Findley, S. (1997). Migration and Family Interactions in Africa. In Adepoju (ed.), *Famil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109-138. Africa. London. England: Zed Books.
- Findley, S. (1999). Women on the Move: Perspectives on Gender Changes in Latin America. *Lieg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
- Graves, P. E. and Lintnerman, Peter D. (1979). Household migrati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ult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Elsevier, 6 (3): 383-404.
- Greenwood, M. J. (1975). Research on internal mig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3: 397-435.

- Greenwood, M. J. (1985). Human migration: theory, models; and empirical studies.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5: 521-544.
- Greenwood, M. J. (1997). Internal Migr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M. R. Rosenzweig and O. Stark, *Handbook of Population and Family Economics*, 647-719. Elsevier.
- Greenwood M. J. et al. (1991). New Directions in Migration Research.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5: 237-270.
- Government Actuary's Department (GAD). (2002). *National Population Projections: 2000-based*. Series PP2 no. 23. London: TSO.
- Halfacree, K. (1995). Household migration and the structuration of patriarchy: evidence from the USA.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 (2): 159-182.
- Harris, J. and M. P. Todaro. (1970).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 126-142.
- Hart, G. (1992). *Imagined Unities: Constructions of the Household in Economic Theory*. In *Understanding Economic Process*, 111-129. ed. S. Ortiz and S. Les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Hart, R. (1975).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Part 2).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5 (3): 289-305.
- Holmlund, B. (1984). Labor Mobility: Studies of Labor Turnover and Migration in the Swedish Labor Market. The Industrial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Stockholm.
- Hondagneu-Sotelo, P. (1994). *Gendered Transitions: Mexican Experiences of Immig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ugo, G. (1999). Gender and Migration in Asian Countries. Lieg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
- Hugo, G. (2006). Population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0 (4): 513-523.
- Jansen, C. (1969). Some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migration. In J. Jackson (Ed.), *Migration*, 60-73. Cambridge, MA: University Press.
- Kanataupun, S. M. (2000). Reframing the Migration Question: An Analysis of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Mexico. *Social Forces*, 78 (4): 1311-1348.
- Kulu, H. and A. Vikar. (2007). Fertility differences by housing type: The effect of housing conditions on of selective moves. *Demographic Research*, 17 (26): 775-802. <http://www.demographic-research.org/Volumes/Vol17/26/default.htm>.
- Lawson, V. A. (1998). Hierarchical Households and Gender Mi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Feminist Extensions to Migration Research. *Progress of Human Geography*, 22 (1): 39-53.
- Lawson, V. A. (2000). Arguments within geographies of movement: the theoretical potential of migrants' stor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4 (2): 175-189.
- Lee, E. S. (1966).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3 (1): 47-57.
- Lee, O.-J. (1984). *Urban-to-rural Return Migration in Korea*.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Seoul.
- Leslie, G. R. and Richardson, A. H. (1961). Life cycle, career pattern and decision to mo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 894-902.
- Lewis, A. (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Manchester School. In A. N. Agarwala and S. P. Singh (eds.), 1990, *The Economics of Underdevelopment: A Series of Articles and Papers*, 400-449.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ang, Z. (2001). Demography of illicit emigration from China: A sending country's perspective. *Sociological Forum*, 16 (4): 677-701.
- Lindgren, U. (2003). Who is the counter-urban mover? Evidence from the Swedish urban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9: 399-418.
- Long, L. H. and Kristin A. Hansen. (1977). Selectivity of black return migration to the South. *Rural Sociology*, 42 (3): 317-331.
- Lowell, L. and Gerova, S. G. (2004). *Diaspora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e of knowledg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Mahler, S. and Pessar, P. (2006). Gender matters: ethnographers bring gender from the periphery toward the core of migration stud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0 (1): 27-63.
- Markham, W.; Macken, P.; Bonjjan, C. and Corder, J. (1983). A note on sex, geographical mobility, and career advancement. *Social Forces*, 61: 1138-1146.
- Markham, W. and Pleck, J. (1986). Sex and willingness to move for occupational advancement: some national sample result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7: 121-143.
- Massey, D. S. (1987). Understanding 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1372-1403.
- Massey, D. S., Arango, J., Hugo, G., Koussouchi, A., Pellegrino, A. and J. E. Taylor. (1993)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 (3): 431-466.
- Massey, D. S. and Felipe Garcia Espana. (1987). *The Social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cience, 237: 733-738.
- Massey D. S. and K. E. Espinosa. (1997). What's driving Mexico-U. S. migration? A theoretical, empirical, and policy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4): 937-999.
- McGee, T. G. (1952). Labour Mobility in Fragmented Labour Markets: the Role

- of Circulatory Migration in Rural-Urban Relations in Asia. In H. I. Safa (ed.), *Toward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ization in Third World Countries*, 47-66.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Hugh, K. E. (2000). Inside, outside, upside down; backward, forward, round and round: a case for ethnographic studies in migr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4 (1): 71-89.
- Meng, Xir (2000). *Labor Market Reform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incer J. (1978).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6: 749-778.
- Morrison, P. A. (1977). The Functions and Dynamics of the Migration Process. In A. A. Brown and E. Neuberger (eds), *Internal Migra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61-72. Academic Press, New York.
- Mueser P. R. (1989).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lo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n migration: interpreting cross-sectional analyses. *Demography*, 26 (3): 499-514.
- Mulder, C. H. (2007). The family context and residential choice: a challenge for new research.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3: 265-278.
- Mulder C. H. and Van Ham M. (2005). Migration histories and occupational achievement.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1 (3): 173-186.
- Newbold K. B. (2001). Counting migrants and migrations: comparing lifetime and fixed-interval return and onward migr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77: 23-40.
- Nivalainen, S. (2004). Determinants of Family Migration: Short Moves vs. Long Moves.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7: 157-175.
- Nyberg-Sorenson, N., van Hear, N. and Endberg-Pedersen, P. (2002a). The migration-development nexus: evidence and policy options: state of art overview.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0: 3-47.
- Nyberg-Sorenson, N., van Hear, N. and Endberg-Pedersen, P. (2002b). The migration-development nexus: evidence and policy optio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0: 49-73.
- Odland, J. and Mark E. (1988). The Effects of Household Organization on the Interregional Variation of Emigration Rates. *Demography*, 25: 567-579.
- Ogden, P. E. (1999). *Population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2 (1): 105-114.
- Ortiz V. (1996). Migration and marriage among Puerto Rican wome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0: 460-484.
- Piore, M. J. (1979). *Birds of Passage: Migrant Labor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venstein, E. G. (1885).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48: 167-235.
- Ravenstein, E. G. (1889).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52: 241-305.
- Radclyffe, S. (1992). Mountains, maidens and migration: gender and mobility in Peru. In Chant, S., editor, *Gender and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30-48. London: Belhaven Press.
- Ramos, F. (1992). Out-migration and Return Migration of Puerto Ricans. In George J. Borjas and Richard B. Freeman (eds). *Immigration and the Work Force: Economic Consequenc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rce Areas*, 49-6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anis, G. and J. C. H. Fei. (1961).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33-565.
- Rees, P. (1997).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forecasting geographical populations. *Journal of the Australian Population Association*, 14 (2): 145-166.
- Rees, P. H. and A. G. Wilson. (1973). Accounts and models for spatial demographic analysis I: aggregate population. *Environmental and Planning*, 5: 61-90.
- Rees, P. H. and A. G. Wilson. (1977). *Spatial Population Analysis*. London: Edward Arnold.
- Reyes B. I. (1997). Dynamics of Immigration: Return Migration to Western Mexico.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CA.
- Riley, N. E. and Gardner, R. W. (1993). Migration Decisions: The Role of Gender. In UN, *Internal Migration of Wome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 New York.
- Roback J. (1982). Wages, rents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0 (6): 1257-1278.
- Rogers, A. (1966). Matrix methods of popula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32: 40-44.
- Rogers, A. (1975). *Introduction to Multiregional Mathematical Demography*. New York: John Wiley.
- Rogers, A. (1990). Requiem for the net migrant. *Geographical Analysis*, 22: 283-300.
- Rogers, A. and Jones, B. (2008). Inferring directional migration propensities from the migration propensities of inf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thematical Population Studies*, 15: 182-211.
- Rogers, A., Jones, B., Partida, V., and Muhidin, S. (2007). Inferring migration flows from the migration propensities of infants: Mexico and Indonesia.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41: 443-465.
- Rogers, A. and Jordan, L. (2004). Estimating migration flows from birth speci-

- fic population stocks of infants. *Geographical Analysis*, 36 (1): 38-53.
- Rogers, A., Raquillet, R; and Castro, L. J. (1978). *Model Migration Schedul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10: 475-502.
- Rossi, P. (1955). *Why Families Move*. Glencoe: The Free Press.
- Rouse, R. (1991). Mexican migration and the social space of postmodernism. *Diaspora*, Spring: 8-23.
- Rozelle, S., Li Guo, Mingqiao Shen, Amelia Hugbart, and John Giles. (1999). Leaving China's farms: survey results of new paths and remaining hurdles to rural migr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58: 367-393.
- Saenz, R. and Davila, A. (1992). Chicano return migration to the southwest: an integrated human capit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6: 1248-1266.
- Sandefur, G. D. and Wilbur J. Scott. (1981). A Dynamic Analysis of Migration: An Assessment of Age, Family, and Career Variables. *Demography*, 18 (August): 355-368.
- Sandell, S. H. (1977). Women and the economics of family migra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9: 406-414.
- Schwartz, A. (1973). Interpreting the Effect of Distance o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 1153-1169.
- Shields, M. P. and Shields, G. M. (1993).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Family Migration and Household Production: U. S. 1980-1985.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59: 768-782.
- Silvey, R. (2000). Stigmatized spaces: moral geographies under crisis in south Sulawesi, Indonesia.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7 (2): 143-161.
- Silvey, R. (2004). Power, difference and mobility: feminist advances in migration stud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8 (4): 490-506.
- Simons, A. B. and Cardona G. R. (1972). Rural-urban migration: who comes, who stays, who returns. *The case of Bogota, Columbia, 1928-1968*.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6: 166-181.
- Singh, A. M. (1984). Rural-to-Urban Migration of Women in India: Patterns and Implications. In J. T. Fawcett et al., *Women in the Cities of Asia: Migration and Urban Adaptation*, 81-107.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Singh, R. D. and S. Aneyeci. (1996/97). Information Gathering, Prior Migration, and The Land Factor in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s: Some Evidence From a Western Sub-Saharan African Region. *The Indian Economic Journal*, 44 (4): 77-91.
- Sjaastad, L. A. (1962). 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Supplement 70: 80-89.
- Skeldon, R. (1997).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global perspective*. Harlow: Addison Wesley.
- Stacheli, L. A. and Lawson V. A. (1995). *Feminism, praxis and human geography*. *Geographical Analysis*, 27: 321-338.
- Stark, O. (1991). *The migration of labor*. Basil Blackwell, Inc.: Cambridge, MA.
- Stark, O. and J. Edward Taylor. (1989).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emography*, 26: 1-14.
- Stark, O. and J. Edward Taylor. (1991). Migration Incentives, Migration Type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101: 1163-1178.
- Taylor, J. E. (1986). Differential migration, networks, information and risk. In Oded Stark, ed., *Migration Theory, Human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147-171. Greenwich, Conn: JAI Press.
- Todaro, M. P. (1969).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 138-149.
- Todaro, M. P. (1980). Internal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urvey. In R. A. Easterlin, ed.,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
- Van Hear, N. and Nyberg-Sorensen, N. (2003). *The migration-development nexus*.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 Wadycki W. J. (1974). Alternative opportunities and interstate migration: some additional results. *Rev Econ Stat*, 56 (2): 254-257.
- Walby, S. (1990). *Theorizing Patriarchy*. Blackwell, Oxford.
- Walker, J. R. (2008). Internal Migration. In L. Blumc and S. Durlauf, eds.: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2nd Ed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 Wang, W. W. and C. Cindy Fan. (2006). Success or Failure, Selectivity and Reasons of Return Migration in Sichuan and Anhui,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8 (5): 939-958.
- Watts, S. J. (1983). Marriage migration: a neglected form of long-term mobility: a case study from Iorin, Nigeri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7: 682-698.
- Weeks, John. (2007). *Population: An introduction of Concepts and Issues*. Tenth Edition. Thomson Wadsworth.
- White M. J., Lorenzo Moreno and Shenyang Guo. (1995).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fertility and migration in Peru: a hazards mode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9: 492-524.
- Williamson, J. G. (1988).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H. Chenery and T. N. Srinivasan,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 North-Holland. Amsterdam.

Wilson, Tom and Bell, Martin. (2004). Comparative empirical evaluations of internal migration models in subnational population projections.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earch*, 21 (2): 127-160.

Yap, Lurene Y. L. (1977). The attraction of cities: a review of the migration literatur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4: 239-264.

Zhao, Yaohui. (2003). The role of migrant networks in labor migration: The case of China.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21 (4): 500-513.

第七章 Chapter 7

国际移民研究及最新动态 Review of Recent Studies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梁 在 李洁瑾 Zai Liang Jiejin Li
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社会学系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内容简介

本章旨在简要介绍与国际移民相关的大量文献，并指明在中国背景下该方向研究的潜在途径。本章特别讨论有关国际移民的四个主要问题。首先是国际移民与其他人口学行为和过程诸如死亡率/健康、出生率和人口分布之间的联系。其次是总结了关于国际移民如何影响移民输出国的发展的研究文献，这些发展主要表现在汇款和回乡创业。再次，我们将讨论最近出现的文献——关于美国的非传统的移民居住地。最后，我们将描述最近收集国际移民数据的几个主要项目，它们可能在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

Abstract

This chapter reviews and synthesizes the recent research literature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pecifically, this chapter addresses four main issues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e is the linkages betwee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other demographic behavior and processes such as mortality/health, fertility, an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Second is to summariz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how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ffects